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の十七世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 瓷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7-10-03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謝, 明良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297/17015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Japa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of Fort Zeelandia, Taiwan

謝明良（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熱蘭遮城是 1624 年荷蘭人在臺灣臺南安平建築的城堡，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 年奉荷蘭東印度公司總公司命令改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城堡本城於 1632 年已大體竣工，並以城堡為中心建立起荷蘭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迄 1662 年鄭成功攻佔熱蘭遮城驅逐荷蘭人之後，鄭氏仍長駐於此，並改地名為安平。¹1683 年清軍大舉攻臺，鄭克塽戰敗投降，清廷仍以熱蘭遮城為軍裝局，但熱蘭遮城卻因 1869 年英軍砲轟安平火藥庫而毀損部份城牆，不久，1874 年二鯤身修築炮臺（億載金城），也從城堡取走不少建材。熱蘭遮城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曾經加以整建，既在城內構築海關長官宿舍，又於 1930 年將宿舍改建成具拱廊形式的展覽館。戰後，城堡改稱「安平古堡」，並增建瞭望塔和史蹟公園。

2003 年，臺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進行《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同年八月計畫共同主持人劉益昌在參酌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李德河教授利用透地雷達探勘熱蘭遮城遺址所得數據，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²目前已發掘七個地點，編號為第 1－7 號探坑。所出遺物的質材種類頗為豐富，而以陶瓷的數量最多。初步觀察，陶瓷器的年代早自十七世紀，晚迄近現代，其時代跨幅基本上涵蓋了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以及戰後臺灣等各個時期。

就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陶瓷的產區而言，無疑是以中國製品的數量居最大多數，但亦包括若干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標本，試略作介紹如下。

一、遺址出土的荷蘭陶瓷

熱蘭遮城第 1、2、5 號探坑出土的荷蘭陶瓷可大致區分為二類。一類是屬於廣義的馬約利卡（Majolica）系作品。此類標本計四件，胎質鬆軟，呈淡黃色調（圖 1a、1b、1c、1d）。其中一件內外施釉，外壁於胎上施罩白色失透性錫釉，而後在釉上以鈷藍進行彩繪，釉層較厚，會剝釉（圖 1d）。其外觀藍彩雖可媲美青花瓷器，所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直接於器胎繪飾鈷料而後施罩透明釉以高溫一次燒成。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四片馬約利卡陶雖僅存殘片，但仍可觀察出是轆轤拉坯成形的瓶罐類，從器形推測，很可能就是被稱為膏藥罐（Albarello）的罐身部位殘件

（圖 2）。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即有多件十七世紀的此類膏藥罐傳世至今（圖 3）。³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器高約十餘公分的小罐很可能是隨著荷蘭人勢力的擴張而攜至各地，如 1613 年沈沒於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即見有這類小罐，⁴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重要據點印尼萬丹（Banten）遺址也曾出土這類作品（圖 4）。⁵

另一方面，除了傳世作品之外，至 1990 年代日本遺址所見荷蘭十七至十八世紀陶瓷標本計約十九件（片），半數以上屬此類膏藥壺。⁶其次，依據 2001 年松本啓子的統計，則分別來自日本八處遺址，統計二十九件的馬約利卡陶器當中，所謂膏藥罐亦佔二十一之多。⁷其中年代最早的標本見於長崎縣大村市慶長三年（1598）建成的玖島城址，⁸以及堺環濠都市日本慶長二十年（1615）地層；⁹不僅如此，在調查增上寺歷代德川將軍墓時也於卒歿於元和九年（1623）的德川秀忠墓發現同類作品（圖 5）。¹⁰結合出土有該類作品之其他遺址之性質或地望，則除了將軍墓、城、大名居宅之外，明顯集中於獲得幕府同意可與外國交易的「五城商人」所在地之長崎、堺、大阪、京都，以及出島荷蘭商館遺址。¹¹這樣看來，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連接東南亞印尼諸國或東北亞日本重要基地的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十七世紀荷蘭陶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此外，由於日本堺市是因朱印船貿易而繁榮的都市，而臺灣即是日本朱印船赴東南亞貿易時的據點，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也於寬永三年（1626）獲得朱印狀得以派遣船隻至臺灣貿易。¹²值得一提的是，在 1636 年 5 月 30 日由巴達維亞總督寄予末次平藏的信函中提到：「陶器和生絲的樣本或模型，收悉。我等遵循閣下的希望，擬將之送往祖國或其他地方製作。並且在接獲時隨即送往貴處」。結合 1633 年 5 月 13 日巴達維亞總督捐予松浦肥前守的書簡也提到：「關於荷蘭陶器，在新年將模型送往荷蘭於同地製作」，均屬日本向荷蘭訂製陶瓷的珍貴記事。¹³因此，不能排除臺灣據點也參與了此一陶瓷訂製時樣本或成品交付等運送事宜。除此之外，1631 年 3 月 23 日荷蘭館長予臺灣長官普特曼斯（Putmans）的信也說：「閣下明年如果方便的話，請為我等考慮黑砂糖少許、釀造啤酒用的瓶、飯桌所使用的上等和粗製陶器」。西田宏子認為此一記

事是日本荷蘭商館向臺灣請求荷蘭陶瓷之証。¹⁴但事實如何？已難確認。其實，對於相信安平壺即啤酒壺的部分學者而言，¹⁵此一記事或許也可釋讀為日本荷蘭商館向臺灣請求燒造於中國但熱蘭遮城以及日本平戶市和長崎市出島荷蘭商館均曾出土的安平壺？而臺灣原住民部落遺址經常出土安平壺一事，或許也可以安平壺為盛酒容器之脈絡來予以理解。

另一方面，《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 1639 年臺灣有「做為膏藥用給理髮師的 Cangan 布」；《熱蘭遮城日誌》也提到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時發現三百名病患正在醫院就診。雖然，當時的醫院概念和今日的情況大不相同，也就是說以當時歐洲而言，外科醫生其實是由理髮師所兼任，然而我們仍可藉由一幅十八世紀繪畫所見置放於外科醫生診療室中的所謂 Albarello 罐（圖 6）及其他用具，而得以遙想熱蘭遮城理髮兼外科醫的工作和醫院的情景。¹⁶如前所述，歐洲不少醫院仍保存有這類膏藥罐，同時荷蘭阿姆斯特丹¹⁷或法國南部里昂（Lyon）特洛廣場（Terreaux Place）等十七世紀遺址也都出土了同類標本。¹⁸依據目前的資料看來，包括 Albarello 膏藥罐在內的所謂荷蘭馬約利卡陶瓷的燒造地點，除了荷蘭北部（Noord-Nederland）、荷蘭南部（Zuid-Nederland）之外，如安特衛普（Antwerpen）等歐洲其他地區亦有生產，¹⁹但詳情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補充。可確定的是，東方臺灣或日本、印尼等地遺址出土的這類作品應該是由荷蘭所攜來的。

二、遺址出土的德國陶瓷

熱蘭遮城出土的德國陶瓷是來自該國萊茵（Rhineland）地區窯場所燒製的鹽釉陶瓷。所出此類標本計有壺把、器身以及器身所飾模印貼花等部位殘片六十餘件（圖 7a、7b、7c、7d），據此可以復原得知作品至少包括了俗稱鬍鬚男（Bartmannskrug, Baardman）的帶把酒壺（圖 8）。酒壺以轆轤拉坯成形，壺頸肩部位浮雕落腮鬍人面，同時經常於顏面下方以及壺腹側面裝飾各式紋章，鬍鬚男一名即來自壺頸肩部位裝飾的人面圖紋。

萊茵地區「鬍鬚男」樣式酒壺延續至近代仍有燒造，但主要燒製於十五至十七世紀，當中又以科隆（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等兩處窯場製品最為著名，熱蘭遮城遺址目前所出標本均屬弗勒亨地區窯場所生產。²⁰應予一提的是，前述出土有荷蘭馬約利卡陶的印尼萬丹，²¹或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等遺址也都出土有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標本（圖 9）。²²特別是日本至西元 2002 年為止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出總數達 115 件（片）的標本只見弗勒亨類型。²³換言之，截至目前可確認之東方遺址所出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似

乎限於弗勒亨類型，不久前公布的臺灣外島澎湖風櫃尾表採的殘片，²⁴也屬同一類型。

就印尼和日本考古遺址出土該類標本的年代而言，前者之萬丹遺址因伴出土十七世紀的安平壺、卡拉克瓷、漳州窯等中國陶瓷和日本肥前窯殘件，故總數約 40 個體的弗勒亨類型標本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至十七世紀。²⁵至於日本出土有該類標本的考古遺跡則限於長崎縣境內，如伴出有荷蘭馬約利卡膏藥罐的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就曾出土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標本，²⁶但是無疑還是以荷蘭商館所在地的出島出土數量最多，長崎市街和平戶市亦見出土例。後者平戶荷蘭商館年代下限為 1641 年，故商館遺跡出土之鬍鬚男酒壺標本的相對年代應在 1641 年之前。²⁷這樣看來，目前東亞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燒製的所謂鬍鬚男酒壺既限於弗勒亨類型，其相對年代亦集中於十七世紀，不僅如此，其考古遺跡也都和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熱蘭遮城是荷蘭人自毀外島澎湖風櫃尾城堡於 1624 年拆遷至安平構築的城堡，而上述兩座城堡遺址均發現有弗勒亨類型陶瓷，這很難說是偶然，而應該說臺灣出土例亦如同印尼、日本般，透露出此類德國陶瓷與荷人的緊密關連。關於這點，我們從 1609 年沈沒於幾內亞灣南部的模里西斯號（*Mauritius*）沈船，²⁸或前引發現有荷蘭馬約利卡陶的 1613 年白獅號等兩艘荷蘭東印度公司沈船都打撈出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²⁹可以推測印尼、臺灣和日本等國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應是由荷蘭人所帶來的。此一推測也符合以往學界推測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於十七世紀荷蘭社會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即荷蘭國內考古發掘已證實中世紀末期荷蘭陶器用頗多是由萊茵地區窯場所輸入，並且其中就包括不少弗勒亨類型的鬍鬚男酒壺。³⁰

或許是由於首先出現於德國萊茵地區的鬍鬚男酒壺外觀所呈現出的詼諧裝飾趣味，深受歐洲人們的歡迎，致使比利時或英國等地的窯場起而倣效，燒製類似的作品。但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的窯場似乎也接受訂製，故傳世的不少鬍鬚男樣式酒壺上的貼花紋章內容，除見有英國、丹麥或奧地利等國王室家徽，還可見到科隆甚或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³¹後者阿姆斯特丹市市徽乃是由三個垂直排列的「X」所構造，分別表示阿姆斯特丹市的三個剋星：水、火和黑死病，是該市十六世紀以來迄今日的市徽（圖 10）。值得注意的是，臺南熱蘭遮城第 2 號探坑出土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樣式酒壺壺身所見貼花紋章雖已殘缺不全，但仍可清晰地辨識出紋章的主題乃是由「X」紋所構成（同圖 7d）。若參照國外收藏之具有類似貼花紋飾的作品，³²可以確認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德國萊茵地區陶瓷當中，正巧包括裝飾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作品在內。雖然流傳於世的裝飾有阿

姆斯特丹市市徽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不止一件，彼此的相對年代也不相同，其既包括十六世紀中期的作品（1560），也有可晚到十七世紀早中期的例子（圖 11），不過現藏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作品（圖 12），由於市徽周邊之細部裝飾圖紋亦和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同類標本之紋飾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認為兩者屬於同一時期、相同窯場所燒製。其次，從前者壺口沿部位由歐洲金工師所裝鑲的具有時代風格的金屬壺蓋看來，學界推測該鹽釉壺應係 1590—1620 年間萊茵瓷場售往荷蘭的典型作例。³³ 此一時代觀，可以做為訂定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同類標本的年代參考依據。

三、遺址出土的日本陶瓷

熱蘭遮城遺址所見日本陶瓷，包括第 3 號探坑出土的十七世紀九州肥前地區的唐津燒。出土殘片為盤類器壁部位，內壁以白色化妝土刷抹波浪形複線紋飾帶，再於上方飾以銅呈色的綠彩和以鐵為發色劑的褐彩而後施罩透明釉燒成，匠心獨運，是肥前地區具有特色的產品，一般稱為「二彩唐津」（圖 13）。

唐津燒開窯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甚或更早的十六世紀中葉，³⁴ 很可能與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所擄回陶工在今佐賀、長崎兩縣松浦地區築窯燒瓷的傳承有關。而所謂「二彩唐津」主要燒造於武雄系的川古窯之谷新、燒峰上、內田大谷、弓野山、庭木山、小田志山、黑牟田和檻ノ木等窯場；唐津燒同時也肩負了十七世紀日本陶瓷外銷的任務，於印尼、泰國、柬埔寨、婆羅洲、汶萊等東南亞國家都曾出土（圖 14）。³⁵ 其中，印尼萬丹遺址曾出土荷蘭馬約利卡陶和德國萊茵地區弗勒亨類型之鬍鬚男酒壺一事，已如前所述。應予一提的是，儘管唐津燒的裝飾技法豐富，但東南亞國家出土例則限於所謂的刷毛目和二彩唐津，³⁶ 此次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標本亦不例外，屬當中的二彩類型，這似乎顯示了當時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的緊密連繫，致使兩地遺址出土的陶瓷組合較為相近，甚至連個別窯作品的種類也有雷同之處。

依據近年的編年成果，二彩唐津始見於 1610—1650 年（II 期），但印尼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出土的二彩唐津和刷毛目等大盤則是屬 1650—1690 年（III 期）的作品。³⁷ 大橋康二在作品編年的基礎之上，結合東南亞以西未見此類作品出土例等現象，指出東南亞遺址所出二彩唐津，恐非經由荷蘭船舶所運達。³⁸ 關於這點，我們不應忘記，在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二彩唐津之前的 1980 年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已曾發現日本肥前陶瓷，並且是屬於十七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青花瓷標本。³⁹ 眾所周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臺灣，翌年與荷蘭簽訂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臺勢

力，因此遺留在臺灣的 1660—1680 年代的日本陶瓷不會是由荷蘭船自日本所攜至的。值得注意的是，左營遺址日本青花瓷的年代正巧屬於清廷為杜絕海上走私貿易，同時企圖孤立鄭成功而於 1661 年採行遷界措施，至 1683 年清軍進攻臺灣，鄭克塽戰敗投降，翌年頒佈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貿易這一期間的作品。換言之，正是日本肥前陶瓷因中國紛亂的局勢而順勢取代中國陶瓷外銷市場這一期間的作品。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相傳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的所在地，而延平郡王鄭氏驅離荷蘭人之後亦長駐於熱蘭遮城，也因此城堡又稱王城。看來上述兩處遺址所出十七世紀後半的日本陶瓷，很可能和當時以臺灣為根據地的鄭氏集團有關。事實上，坂井隆已曾指出鄭氏集團及其後繼者才是十七世紀日本陶瓷外銷的最大功臣，⁴⁰ 近年同氏又援引 1681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給廈門商館長的書信，證實鄭氏商船確曾赴日本購買陶瓷。⁴¹ 就此而言，熱蘭遮城和左營遺址會留下此一時期的日本陶瓷或許可說是極為自然之事。此外，臺南市民族文物館亦舊藏有年代約在 1650—1670 之間的本伊萬里青花小瓷罐（圖 15），⁴² 結合前述考古發掘遺物，表明十七世紀日本的陶瓷似有不少是先運抵臺灣而後再外銷至東南亞或歐洲等地，泰國 Thao Khot 遺址即曾出土與前引臺南市民族文物館完全一致的作品（圖 16），⁴³ 但其是否經由臺灣所輾轉傳入？目前已不得知。

四、遺址出土的泰國陶瓷

（一）Singburi 窯系無頸四繫罐

此類標本計有二件。其中一件為繫耳殘件，表施褐釉，出土於第 5 號探坑（TP5-IV.9 L4f）。另一件亦屬罐肩部繫耳部位殘件，後者係出土於遺址第 3 號探坑的最底層（TP3 A-12, L4a），與所謂的安平壺殘片共伴出土，素燒無釉，淺磚紅色胎中夾雜有砂石狀雜質（圖 17）。有趣的是，同類磚紅色胎無釉素燒四繫罐，於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十七世紀居住遺址亦曾出土（圖 18），據說是做為收貯壁爐灰燼的容器。⁴⁴ 這樣看來，考古發掘既證實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泰國中部 Singburi 窯系無頸的繫罐，而若結合國外沉船或陸地遺址所見同類標本，⁴⁵ 同時參酌熱蘭遮城築城史事以及出土遺址層位和共伴瓷片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 Singburi 窯系標本之年代應在十七世紀。由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 1609 年 *Mauritius*、1613 年 *Witte Leeuw*、1656 年 *Vergulde Draeck* 等沉船，以及 1622 年由荷人構築的風櫃尾城址均見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因此又可推測 1624 年破土開基，⁴⁶ 大體竣工於 1632 年的臺南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土同類標本，很有可能是由荷蘭人所攜來的。在此應予一提的是，新近公布的

臺灣淇武蘭遺址（現象 H166）也出土了泰國短頸四繫罐，罐口沿外卷、束頸、弧肩、肩以下微弧內縮成大平體，頸肩部位置四半環形橫繫並施罩偏黃的橄欖色釉，從圖片看來製品燒結良好，通高 58.8 公分（圖 19）。⁴⁷ 由於其整體器式特徵和前引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前半之 *Akang Aow* 沈船以及 1600 年 *San Diego* 沈船所見泰國四繫罐相近，故可推測淇武蘭遺址同類帶繫罐的年代也和流傳於臺灣排灣族 *Noi* 窯系四繫罐般，約於十六世紀且不晚於十七世紀初。考慮到 1626 年西班牙人侵佔臺灣基隆，1634 年又將蘭陽平原命為 *Canbaran* 的傳教省區，其時並有淇武蘭（*Qipaur*）的村落名稱。⁴⁸ 結合淇武蘭遺址所出陶瓷組合，如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製黃褐釉劃花罐等製品又見於西班牙籍 *San Diego* 沈船打撈品，看來淇武蘭遺址之泰國陶瓷極有可能是由西班牙人所攜入。

（二）印紋陶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共計七件，均出土於 2005 年發掘的第 7 號探坑，由殘片推測是屬於罐的口頸和身腹部位殘件（圖 20），另從標本的胎質和印紋裝飾特徵，可以確認其應是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即《清史·暹羅傳》之「阿由提亞」，華僑所謂「大城」及其鄰近地區窯場所燒造。⁴⁹ 關於其年代，我以前曾經粗略地整理過東南亞海域沈船以及日本陸地考古遺址之發現例，指出前述發現有泰國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的 *Ko Khram Ko Si Chang I III*（圖 21）或 *Witte Leeuw* 等十五至十七世紀沈船都伴出了同類印紋陶。其次，出土有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的日本考古遺址如沖繩（首里京之內）、福岡（博多）、長崎市（萬才町、榮町、興善町）等遺址也都出土了此類陶器。⁵⁰ 綜合目前所見出土有這類印紋陶器之沈船或陸地遺址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其集中於十五至十七世紀，故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的年代也應在這一時期。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留意到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屬於罐身腹部位殘片之印紋裝飾，和日本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宅出土同類標本幾乎完全一致（圖 22），⁵¹ 也因此興善町八尾邸宅出土標本的相對年代就成了進一步判別熱蘭遮城遺址印紋陶年代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今日所謂的興善町，原稱新町（自江戶時期至昭和三十八年改名為止），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父末次興善於文祿元年（1592）所建設的市鎮，末次興善則是長崎開港不久即往來於博多、臺灣之間貿易並因而致富的著名資本家。發掘出土有與熱蘭遮城遺址酷似的泰國印紋陶的地點，位於江戶時代擔任新町乙名（世襲的協助處理市政的要員）八尾家的邸宅。文獻記載八尾家的先祖是出身地河

內之八尾的以商販甲冑為業的源左衛門，亦即新町初代乙名，其就任日期可能在元和四年（1618）或寬永十五年（1638）。⁵² 無論如何，連同遺址住居柱石、地下室、水井等遺構所出遺物計約三萬餘件，而從大量的燒造於 1650—60 年代之有田皿山外銷用陶瓷係出土於充斥瓦礫和燒土的灰坑，結合文獻記載，報告書執筆者永松實等人推測，其極可能是發生於寬文三年（1603）江戶期最嚴重的一次火災後的遺留。⁵³ 這從遺址出土日本和中國陶瓷主要集中於十六世紀末至 1660 年代之前一事，亦可得到佐證。⁵⁴ 如果此一判斷無誤，則興善町遺跡（八尾邸宅）出土的泰國印紋陶壺，以及與之雷同的熱蘭遮城所見標本之相對年代，也應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中期。

五、遺址出土的越南陶瓷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包括硬陶和施釉炆器等兩類。硬陶至少有四件，其中三件呈紅褐色調，無釉，器表略成鐵鏽光澤，薄胎，胎中羶白色雜質，整體以高溫燒成。器表陰刻複線弦紋，弦紋上方另飾垂幕式波形梳紋（圖 23）。類似的標本於日本九州長崎市榮町、⁵⁵ 勝山町、⁵⁶ 金屋町、⁵⁷ 爐粕町、⁵⁸ 岩原目付屋等遺跡⁵⁹ 或堺環濠都市遺址等都曾出土，⁶⁰ 據此可知上述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應屬壺、罐或甕類之頸肩部部位的殘片。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高溫硬陶器應來自越南窯場所生產，特別有可能是越南中部窯場的製品（圖 24）。⁶¹ 另一方面，1970 年代劉文三著《臺灣早期民藝》一書所收錄的一件臺灣古厝傳世的四繫罐（圖 25），⁶² 罐口沿略呈唇口，口部下方肩部部位飾三道凸弦紋，弦紋之間陰刻波狀梳紋，並於對稱部位安四只繫耳。繫耳和凸弦紋下方另飾四道陰刻複線紋，複線紋之間裝飾有淺陰刻的波形梳紋，無疑亦來自越南所產。⁶³ 參酌越南惠安或日本九州、堺市等可判明該類作品相對年代的考古資料看來，前述熱蘭遮城遺址或臺灣古厝傳世的越南硬陶器的年代也約在十七世紀。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另一件越南硬陶（*ZLDA-94-TP7-III, 1, L4c*），為罐的身腹部位殘片。從殘片看來，是以轆轤拉坯成形，修整不講究，器內外留有明顯的拉痕。從斷面看來，器胎青灰當中夾有淺灰狀色層，整體呈大理石或所謂「墨流」般之層狀紋理，極具特色（圖 26）。而這種以青灰、淺灰兩種不同胎土練合而成的高溫硬陶，則是越南炆器常見的特徵之一，⁶⁴ 結合殘片器形，可以推測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應是越南中部一帶窯場所燒造的大口高瓶（圖 27）。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越南中部廣平省首都同會（*Dong Hoi*），特別是朔莊省（*Sóc Trăng*）窯群都燒造有這類高瓶。由於後者朔莊省（*Sóc Trăng*）窯址已經正式發掘，從而可知日本等地出土的

此類大口高瓶應是來自越南中部窯場所生產，窯場的存續時代約於十六世紀中後期至十七世紀前半期。⁶⁵ 另一方面，就日本出土例而言，類似的大口高瓶多見於森本朝子所區分的第三期（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出土地點則集中在以堺、大阪為中心的九州東岸和瀨戶內海沿岸，值得一提的是，平戶荷蘭商館建造之前的地層也出土了此類高瓶。⁶⁶ 另外，前引日本金屋町或爐粕町等遺跡亦如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均同時伴出了越南複雜陰刻弦紋硬陶以及大口高瓶等兩類標本。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施釉炆器是見於第 5 號探坑的一件白釉綠彩標本（圖 28）。從標本的胎、釉特徵結合其所貼飾的檳榔藤蔓和椰果，可知其應為裝盛食用檳榔石灰的容器（Limepot）（圖 29）。學界對於這類越南石灰罐的年代見解分歧，有十五世紀、⁶⁷ 十五至十六世紀⁶⁸ 和十六至十七世紀等不同說法。⁶⁹ 雖然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是否確實用來裝盛檳榔用石灰？目前已難確認。不過，從相對年代約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越南 *Hoi An* 沉船發現有施單色釉的石灰罐，⁷⁰ 可知此類小罐年代或可上溯十五至十六世紀，但若參酌熱蘭遮城的築城年代以及遺址白釉綠彩標本的共伴遺物等看來，於白釉上施綠彩之石灰罐的相對年代有可能是在十六至十七世紀之間。此一年代觀有助於今後越南白釉綠彩石灰壺的定年。

小結

就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陶瓷而言，除了本文已涉及的十七世紀標本之外，亦可見到晚迄十九世紀的作品。眾所皆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臺灣翌年與荷蘭簽定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臺勢力，至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臺灣才結束了鄭氏祖孫三代在臺統治。清朝殖民臺灣百年之後又因日清甲午戰爭，清軍潰敗而於 1895 年和日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予日本。此後要到 1945 年中國國民黨軍隊登陸臺灣，才又結束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因此，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十九世紀歐洲陶瓷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而傳入？此一涉及消費群的議題值得略予探討。以出土的白陶煙斗為例，作品已殘缺，僅存部份火斗和一小截殘柄（圖 30），但仍可輕易地觀察出作品係模製成形，斷面胎土潔白細膩略泛黃色調。另從填塞煙草的火斗器表留有多道縱向捺磨痕跡可知作品曾經打磨工序，故打磨部位微泛木頭般溫潤的光澤。這類俗稱為 Clay Pipe 的陶煙斗最早出現於十六世紀後半的英國，但由於英國的禁煙政策造成陶煙斗製造業移往荷蘭發展，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已成為歐洲最重要的陶煙斗製造和交易中心。⁷¹ 另一方面，隨著 1668 年位於海牙附近的豪達（Gouda）市當局宣布營運煙斗市場以來，到了十八

世紀豪達已取代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成為世界陶煙斗製造都市。儘管十七世紀初期英國和荷蘭生產的陶煙斗之造型相近，不易區別，但之後於荷蘭製造的陶煙斗既可經由火斗（bowl）的造型和尺寸大小予以年代區分，⁷² 至於經常見於火斗下方突出之跟部上方的認證標誌，以及跟部截面所見作坊商標（heel with heel marks）更是提供編年的絕對依據（圖 31）。就此而言，此次熱蘭遮城出土的白陶煙斗跟部即鑄印有豪達市政府的認證標記，另從跟部底面所飾魚形作坊標幟，可知其是來自豪達市的以魚形為品牌的作坊所生產。其次，從豪達市標記下方另見一小凸圓點，結合煙管（stem）部份所施加的繩紋印花裝飾，可以推測標本的年代約在 1850 年至 1940 年之間，⁷³ 亦即清朝據臺後期至日治時期。然而，到底是清人抑或日本人才是此一白陶煙斗的使用者？關於這點，我們從日本九州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以至關東地區不少遺址均出土有十八至十九世紀荷蘭白陶煙斗可知，日本當時頗風行以白陶煙斗喫煙的習俗，故不排除熱蘭遮城遺址所出來自荷蘭豪達市的白煙斗是由日本人輾轉攜入臺灣的。換言之，出土標本的消費者或可指向日本人。另外，我們也應留意熱蘭遮城所出白陶煙斗是屬於豪達市製品中所謂「Fijné Pipé」，即以瑪瑙石研磨器表使之產生溫潤光澤的僅次於最高級（Procelijne）的上級品，而若依據 1700 年豪達市煙斗製造工會的規定，此一等級陶煙斗的煙柄長度不得短於 53 公分，⁷⁴ 這對於復原熱蘭遮城標本器形甚至判定消費族群的經濟能力或亦有所助益。臺灣熱蘭遮城遺址之外，我們亦應留意香港九龍西貢沙咀（Sha Tsui, Sai Kung）所發現的一艘沉船亦見泰國陶瓷，從報告書所揭示的圖版看來，我推測沉船所出黑褐釉長頸罐口沿殘片可能來自 Sisatchnalai 窯系製品（圖 32）。⁷⁵ 由於罐的口頸部位特徵和馬來半島 *Turiang*、⁷⁶ 印尼加里曼丹 *Bakau*⁷⁷ 等兩艘十五世紀前半沉船打撈上岸的同類四繫罐的外觀特徵一致，故可推測西貢沙咀沉船的泰國陶瓷的年代也在十五世紀前半，並且同屬四繫罐的殘片。

事實上，東南亞陶瓷不僅曾出現在中國廣東省外島香港，也出沒於中國沿海省分，甚至於還因其有利於夏日貯水而博得時人好評，以致於還被課以關稅。如張燮《東西洋考》就記載萬曆十七年（1589）「番泥瓶」每百個稅銀四分，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因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故「每百個稅銀三分四釐」。⁷⁸ 明末崇禎年間修撰的福建《海澄縣志》也提到有一種「夷瓶」，是「以夷泥為之，陶而成器俗名干杯，夏日貯水可以不敗。出下港者其色紅」。⁷⁹ 我認為所謂「番泥瓶」應即「夷瓶」。問題是傳言出自下港（今印尼萬丹）的紅胎番泥瓶或夷瓶指的到底又是什麼呢？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其極可能就是此次熱蘭遮城遺址亦曾出土並流行於東南亞地區，

主要來自泰國中部 Ayutthaya (大城) 地區所燒造的低溫素燒陶罐。由於該類素燒陶器器體無釉可以透氣，同時因外表水分蒸發時所產生的氯化熱可以冷卻罐內的水，因此確實有利夏日貯水。應予一提的是，該類泰國素燒陶罐也隨著船舶出沒各地，如 *Bakau* (圖 33)、*Koh Khram*、*Pattaya*、*Ko Si Chang*、*Witte Leeuw* 等多艘十五至十七世紀沉船都可見到這類標本。臺灣之外，前引西貢沙咀十五世紀沉船⁸⁰ 以及大嶼山竹篙灣一處推測是往來廣東至東南亞的中途據點，也出土了同類素燒陶罐殘片。報告者認為竹篙灣遺跡陶瓷可能和來華的葡萄牙人的活動有關 (圖 34)。⁸¹ 不過，由於葡萄牙人首次訪問中國的年代是在 1514 年，並於 1518 年初次造訪暹羅，⁸² 因此相對年代約於十五世紀前半的竹篙灣出土泰國陶瓷不太可能和葡萄牙人有關，⁸³ 而有較大可能是暹羅或中國商船的遺留。另一方面，圍繞於這類泰國素燒陶罐的浪漫典故似乎不少，除了前述夏日貯水可以不敗的中國記事，日本亦將泰國素燒陶罐轉用於茶席中裝盛洗濯茶碗、補充茶釜用水的水指或裝盛洗濯茶碗廢水的建水。

特別值得一提的，任職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理蕃課的瀨川孝吉 (1906—1998) 於 1928 至 1939 年所拍攝的排灣族頭目盛裝照，頭目身旁女子前方所置高度及膝的施釉大口四繫罐 (圖 35)，⁸⁴ 無疑是來自泰國 Singburi 縣 Noi 河窯系所燒製；從沈沒於 1600 年的菲律賓海域 *San Diego* 沉船亦見同類遺物 (圖 36) 等推測遺留在排灣族居地之泰國四繫罐的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⁸⁵ 其和荷蘭畫家 Cornelis Bega (1631/32—1664) 繪於 1663 年的畫作中也將臺南熱蘭遮城亦曾出土的泰國四繫罐做為畫面的題材 (圖 37)，⁸⁶ 所欲傳達的訊息形成有趣的對比。

註

1 有關熱蘭遮城築城的經緯，可參見村上直次郎 (韓石麟譯)，〈熱蘭遮城築城史話〉，《臺南文化》3-3 (1953)，頁 11-13；3-4 (1954)，頁 45-48。

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第一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一期中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期初報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5)。

3 Liliane Sfeir Fakhri, 〈リヨンと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マジョリカ陶器：日本の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イタロ＝フランス様式のリヨンのアルバレッロ〉，收入イタリア・ファエンシア國際陶藝博物館所藏《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1)，頁 160。不過，該文作者將作品年代定在十六世紀末。

4 G.C.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p. 249.

5 大橋康二等，〈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82 集 (1999)，頁 76 及圖版 9 之 12。

6 鈴木裕子，〈日本出土のオランダ陶器—17, 18 世紀を中心に—〉，收入前引《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頁 138。

7 松本啓子，〈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收入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局編，《マジョリカ名陶展》(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頁 169 表一。

8 川口洋平，〈大村、玖島城出土のオランダ陶器〉，《考古学ジャーナル》No. 462 (2000.8)，頁 29，圖 2。另據同文頁 31 註 (2) 稱，遺物下限約於 1610 年代。

9 松本啓子，〈大阪出土のオランダ色繪壺〉，《葦火》45 (1993)，此轉引自前引鈴木裕子，〈日本出土のオランダ陶器—17, 18 世紀を中心に—〉，頁 141。

10 鈴木尚等編，《増上寺徳川將軍墓と遺品、遺體》(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7)，此轉引自西田宏子，〈茶陶の阿蘭陀〉，收入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1987)，頁 73。

11 松本啓子，同前引〈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頁 171。

12 永積洋子，《朱印船》(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頁 179。

13 以上兩則檔案均轉引自西田宏子，同前引〈茶陶の阿蘭陀〉，頁 78-79。

14 西田宏子，同前引〈茶陶の阿蘭陀〉，頁 78。

15 陳國棟曾經指出，江樹聲已懷疑法佗退音 (Valentijn) 說「三燒」(Sampsoe) 即「中國啤酒」(Chinese Beer) 的說法，因此在翻譯《熱蘭遮城日誌》時，將之譯成「麥酒」。陳氏在此一提示之上，結合西文「Shamsoo」即「三燒」，也就是經過三次蒸餾的米酒的說法，認為安平壺就是《熱蘭遮城日誌》所載「燒酒」的容器。參見同氏，〈十七世紀的荷蘭史地與荷據時期的臺灣〉，《臺灣文獻》54 卷 3 期 (2003)，頁 114-115。

16 大橋康二，〈輸出した伊万りの医療品〉，《目の眼》No. 283 (2000.4)，頁 54-55。另外，正當我為巴城日誌中所謂膏藥用的「Cangan 布」到底指的是什麼而煩惱不已並四下向人打聽時，很慶幸地從臺大藝術史所博士生王淑津處得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國棟教授已考證「Cangan」主要是指中國製造的粗棉布，荷蘭人拿來銷往東京、廣南、柬埔寨和菲律賓群島；1625 年荷蘭人在臺灣向新港社買到的第一塊土地就是用十五疋 Cangan 交換得到的。參見陳，〈轉運與出口：荷據時期貿易與產業〉，《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

亞》(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3), 頁 69-70, 以及同氏, 〈十七世紀初期東亞貿易中的中國棉布—Cangan 與臺灣〉, 慶祝曹永和院士八十大壽國際學術研討會《近代早期東亞海洋史與臺灣島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0)。承蒙國棟兄惠賜論文影本, 謹誌謝意。

17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 《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ケー》(東京: 東京都歴史文化財團等, 1996), 頁 120, 圖 1-98。

18 Liliane Sfeir Fakhri, 同前引〈リヨンとイタリア、ルネサンスのマジョリカ陶器: 日本の遺跡から出土したイタロ=フランス様式のリヨンのアルバレッコ〉, 頁 160-165。

19 松本啓子, 同前引〈大阪城下町出土マジョリカ陶について〉, 頁 168。

20 有關萊茵地區鹽釉陶瓷的分區以及科隆、弗勒亨等窯場作品的樣式特徵參見 David Gaimster, *German Stoneware 1200-1900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97), pp. 191-193; 208-211. 另外, 弗勒亨鹽釉陶窯址出土標本可參見 Karl Göbels, *Keramik—Scherben aus Frechen* (Köln: Rheinland-Verlag, 1980). 以上這筆德文資料承蒙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陳玉秀女士提供, 她還為我中譯了部份文字, 謹致謝意。

21 大橋康二等, 同前引〈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 頁 77。

22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國指定史跡《出島和蘭商館跡—護岸石垣復元事業に伴う発掘調査及び工事報告書一》(長崎市: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 2001), 頁 64, 圖 38 之 60。

23 桜庭美咲, 〈鬚德利〉, 《國華》1295 號 (2003), 頁 27。

24 盧泰康, 〈澎湖風櫃尾荷據時期陶瓷遺物之考證〉, 《故宮文物月刊》19 卷 5 期 (2001), 頁 128。

25 大橋康二等, 同前引〈インドネシア・バンテン遺跡出土の陶磁器〉, 頁 77。

26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 同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ケー》, 頁 84, 圖 2 之 17。

27 桜庭美咲, 同前引〈鬚德利〉, 頁 27。另外, 有關日本遺址出土鬚鬚男酒壺標本的考察, 可參見同氏, 〈江戸時代に舶載されたライン炆器酒器についての一試論〉, 《武藏野美術大學研究紀要》30 (1999), 頁 101-114。

28 M. L'Hour and L. Long, *The Wreck of An "The Wreck of An 'Experimental' Ship of th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 The Mauritius (160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eal Archaeology and Underwater Exploration, 19-1 (1990), p. 68.

29 G. C. Vander Pijl-Ketel,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 Witte Leeuw,"* pp. 246-247.

30 Jan M. Baart, 〈アムステルダムの歴史と考古学〉, 收入小林克編, 《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東京: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02), 頁 281-282。

31 前田正明, 同前引《西洋陶磁物語》, 頁 163。另外, 圖版可參見 David Gaimster, *German Stoneware 1200-1900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p. 214, fig. 53; p. 215, fig. 56; p. 216, fig. 57; p. 218, fig. 62; p. 220, fig. 67 等。

32 Keramik Museum Frechen 收藏有年代分別在 1560 年 (A95)、1594 年 (A242) 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市徽的鬚鬚男酒壺。詳參見該館網址資料 (www.rheinische-keramik.de)。此感謝弗勒亨陶瓷博物館研究員 Kleine 女士的教示。另外, David Gaimster, *German Stoneware 1200-1900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History*, p. 220 亦揭示一件相對年代在 1600-1650 年間的作品。

33 《特別展 阿蘭陀—鎖国下のエキゾチシズム—》(東京: たびこと塩の博物館, 1996), 圖 69。桜庭美咲, 同前引〈鬚德利〉, 頁 27 及圖版 6。神戸市立博物館編, 《神戸市立博物館館藏品目録》美術の部 10 工芸品 (神戸: 神戸市立博物館, 1993), 頁 10, 第 61 號。

34 大橋康二, 《肥前陶磁》(東京: ニューサイエンス社, 1976), 頁 6-7。

35 中里太郎右衛門, 〈唐津〉, 收入《世界陶磁全集》7 (東京: 小學館, 1980), 頁 159-161。

36 中里太郎右衛門, 同前引〈唐津〉, 頁 161。

37 盛峰雄, 〈陶器の編年〉, 收入《九州陶磁の編年—九州近世陶磁學會 10 週年紀念—》(佐賀縣: 九州近世陶磁學會, 2000), 頁 11-12。

38 大橋康二, 〈東南アジアに輸出された肥前陶磁〉, 收入《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佐賀縣: 九州陶磁文化館, 1990), 頁 112。

39 臧振華等,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的試掘〉,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 3 (1993), 圖版 11; 以及謝明良, 〈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出土陶瓷補記〉, 《臺灣史研究》3-1 (1997), 頁 237-238。

40 坂井隆, 〈肥前陶磁の輸出と鄭氏、バンテン王國〉, 《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22 (1996), 頁 82。

41 坂井隆, 《「伊万里」からアジアが見える》講談社選書メチエ (東京: 講談社, 1998), 頁 236-237。

- 42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編《民族文物館藏品選集》(臺南:臺南市政府,1989),頁6,圖12;另外,作品的年代可參見大橋康二,〈鄭成功とイマリ〉,《目の眼》261(1998),頁66。
- 43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同前引《海を渡った肥前のやきもの展》,頁151,圖350。
- 44 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江戸、長崎、アムステルダム、ロンドン、ニューヨーク》(東京:東京都歴史文化財團,1996),頁118,圖1-92。不過,該文作者阿姆斯特丹市考古局 Jan M. Baart 是將這件四繫罐判定為中國十七世紀製品。
- 45 謝明良,〈遺留在臺灣的東南亞古陶瓷—從幾張老照片談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2(2007),頁1-50。
- 46 村上直次郎(韓石麟譯),同前引〈熱蘭遮城築城史話〉,頁11-13;3-4(1954),頁45-48。
- 47 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4(宜蘭縣:宜蘭縣政府,2008),頁208,圖版461。
- 48 中村孝志著,賴永祥譯,〈十七世紀西班牙人在臺灣的佈教〉,收入《臺灣史研究—初期》(1970);李壬癸,《宜蘭縣南島民族與語言》(1996)。以上二文均轉引自陳有貝等,《淇武蘭遺址搶救簡報》1(宜蘭縣:宜蘭縣政府,2008),頁11。
- 49 自1970年代 Spinks 指出其產地是在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tthaya)以來(Charles N. Spinks, "The Ayuddhaya-Period Earthenwares, Some Contemporary Thai Kilns, Their Wares and Potting Methods,"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64-2 (1976), pp. 188-189),近年泰國學者也證實了阿瑜陀耶近郊帕尼亞(Paniat)即為產地之一(森本朝子,〈博多出土のタイ陶磁について—アマラ・スリセッチャ氏に聞く〉,《法哈達》1(1992),頁49)。其次,阿瑜陀耶(大城)北郊亦曾發現燒造這類印紋陶壺的窯址(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京都:茶道資料館,2002),頁203)。
- 50 謝明良,〈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瓷〉,《故宮文物月刊》21卷7期(總247期,2003),頁76-87。
- 51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興善町遺跡—日本團體生命保險株式會社長崎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1998),頁74,圖44。與熱蘭遮城遺址印紋陶器酷似的作品之清楚圖片,參見東京都江戸東京博物館,同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頁85。
- 52 原田博二,〈新町乙名八尾家について〉,收入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前引《興善町遺跡》,頁5-7。
- 53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同前引《興善町遺跡》,頁1。
- 54 大橋康二,〈出土遺物〉,同前引《興善町遺跡》,頁36。
- 55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榮町一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1993),頁64,圖43之31。
- 56 長崎市教育委員會,《勝山町遺跡—長崎市櫻町小學校新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教育委員會,2003),頁23,圖14。
- 57 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金屋町遺跡—オフィスメーション(株)ビル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長崎:長崎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協議會,2002),頁107,圖13。
- 58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岩原目付屋敷跡爐粕町遺跡—歴史文化博物館建設に伴う埋藏文化財發掘調查報告書(下)—》(長崎:長崎縣教育委員會,2005),頁78,圖70之943。
- 59 長崎縣教育委員會,同前引《長崎奉行所(立山役所)跡》,頁56,圖48之602。
- 60 續伸一郎,〈堺環濠都市遺跡出土のベトナム陶磁器〉,收入櫻井清彥等編,《近世日越交流史》(東京:柏書房,2002),頁290-91。
- 61 森本朝子,〈ベトナムの古窯址〉,收入《南蠻、島物—南海請來の茶陶》(東京:根津美術館,1993),頁139;菊池誠一,《ベトナム日本町の考古學》(東京:高志學院,2003),頁224,圖6之6參照。
- 62 劉文三,《臺灣早期民藝》(臺北:雄獅圖書公司,1978),頁61彩圖。
- 63 如越南中部窯群即出土有類似的四繫罐。圖參見菊池誠一,同前引《ベトナム日本町の考古學》,頁224,圖6之6。
- 64 菊池誠一,同前引《ベトナム日本町の考古學》,頁194。另參見同氏和阿部百里子合著,〈ベトナム燒締陶器の製作技法〉,收入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紀要,《ベトナム ホイアン考古學調查報告書》vol. 4(1997),頁183-191。
- 65 菊池誠一,同前引《ベトナム日本町の考古學》,第四章〈中部ベトナムの陶器生産の展開と歴史的背景〉,頁211-240。
- 66 森本朝子,〈ベトナム陶磁—日本における研究の成果と課題〉,收入東洋陶磁學會三十周年紀念《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在—》(東京:東洋陶磁學會,2002),頁287。
- 67 Philippe Truong, "Limepot," in John Stevenson and John Guy eds., *Vietnamese Ceramics* (Chicago: Art Media Resources with Avery Press, 1997), p. 393, fig. 426.
- 68 尾崎直人,《ベトナムの陶磁》(福岡:福岡市美

術館，1992），頁 84，圖 128。

69 Kerry Nguyen Long, “The Vietnamese Limepot,” *Arts of Asia*, 27-5 (1997), p. 69, fig. 10.

70 *Treasures of the Hoi An*, Butterfields (San Francisco: 2000), p. 53, no. 6285.

71 谷田有史，〈日本のきせるとクレイパイプ〉，收入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頁 223。

72 Wiard Krook, 〈オランダで発掘されたクレイパイプ〉，收入前引《掘り出された都市—日蘭出土資料の比較—》，頁 236-237。

73 Don Duco, *Merken van Goudse Pijpenmakers 1660-1940*, Cochem/ Poperinge, 1982, p. 111. 此轉引自谷田有史，〈日本のきせるとクレイパイプ〉，頁 225 以及小林克，〈オランダからきたクレイパイプ〉，收入江戸遺跡研究會編，《甦る江戸》（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1），頁 281，圖 16。

74 Wiard Krook, 同前引〈オランダで発掘されたクレイパイプ〉，頁 249-250。

75 Frost R. T, Ho and Ng. B, “Sha Tsui,” *Journal of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 vol.V (1974), p.32, fig. 9. 該報告書已經辨識出作品屬泰國 Sawankhalok 窯作品，但認為年代在十四世紀。

76 Roxanna M. Brown, *Turiang: A Fourteenth Century Shipwreck in Southeast Asia Waters* (Pasadena, CA: Pacific Asia Museum, 2000), p. 29, pl. 18. 由於 *Turiang* 沉船文物與十五世紀前半印尼 *Bakau* 的作品極為類似，因此 Roxanna M. Brown 亦已放棄十四世紀的說法，修訂認為 *Turiang* 應是 1400-1424/30 沉船。參見同氏，“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 in Southeast Asi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4), p.139.

77 Michael Flecker, “The Bakau Wreck: An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0-2 (2001), pp. 221-230. 文末附圖，作品現藏紐西蘭，筆者實見。

78 張燮，《東西洋考》國學基本叢書（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68），卷 7，頁 96、98。

79 梁兆陽修，《海澄縣志》，收入《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卷十一頁十五（頁 442）。

80 Frost R. T, Ho and Ng. B, “*Tha Tsui*”, p. 31, fig. 8.

81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招紹瓚等），〈香港澳門五十年來的考古收穫〉，頁 516-517。另外，標本圖片可參見周若水，〈陶瓷之路—竹篙灣出土文物〉，《中國文物世界》67（1991），頁 115，圖右上。但周氏認為竹篙灣遺址也有可能和十六世紀最早來華葡萄牙人的活

動有關。

82 張天澤著（姚楠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頁 38、131 等參見。

83 與竹篙灣泰國印紋陶片和貼花紋壺最為接近的作品見於相對年代約在十五世紀前半的 *Bakau wreck* 等沈船，參見 Michael Flecker, “The Bakau Wreck: An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0-2 (2001), p. 228.

84 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臺灣高砂族の服飾—瀨川コレクション—》（東京：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3），頁 74，左上圖。

85 Jesus T. Peralta, *Saga of the San Diego*, p. 88, fig. 30; Jean-Paul Desroch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p. 237.

86 Peter C. Sutton et. al., *Masters of Seventeenth Century Dutch Genre Painting*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1984), pl. 34.



圖 1a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b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c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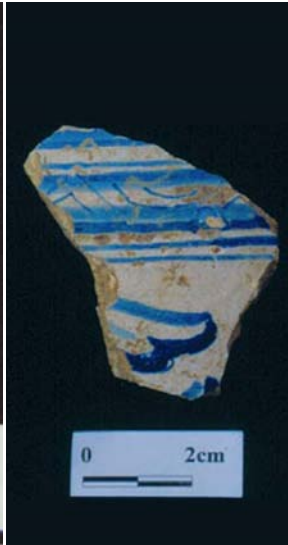


圖 1d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罐身部位殘件



圖 3 法國特華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傳世藥罐



圖 4 印尼萬丹 (Bantan) 出土



圖 5 日本德川秀忠將軍墓出土 1623 年



圖 6 十八世紀歐洲畫作所見外科診療



圖 7a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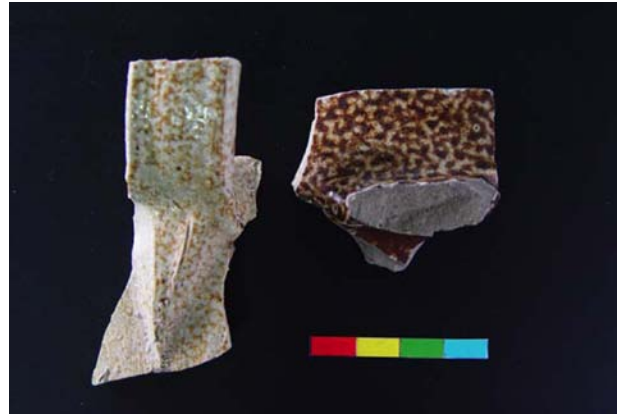


圖 7b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7c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7d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8 Keramik Museum Freche 藏



圖 9 印尼萬丹出土



圖 10 阿姆斯特丹市市徽



圖 11 Kennemer land 沈船
打撈作品 1664 年



圖 12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
日本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圖 13 肥前二彩唐津



圖 14 二彩唐津
泰國 Nakhon si Thammarat 出土



圖 15 臺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圖 16 泰國 Thao Khot 寺出土
肥前青花小罐



圖 17 Singburi 窯系帶繫罐標本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8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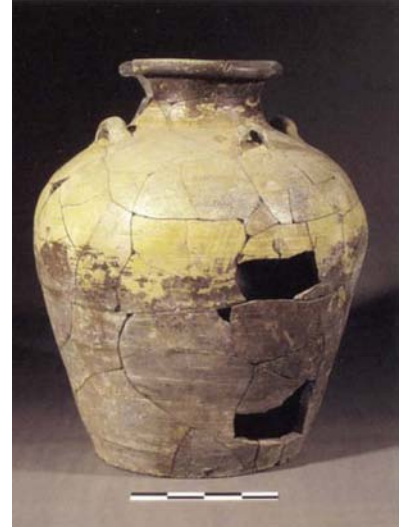


圖 19 泰國四繫罐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圖 20 泰國印紋陶殘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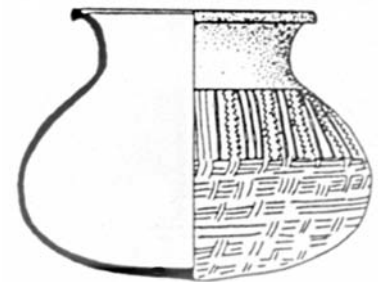


圖 21 泰國 Ko Si Chang 沈船打撈品線繪圖



圖 22 泰國印紋陶殘片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出土



圖 23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越南陶瓷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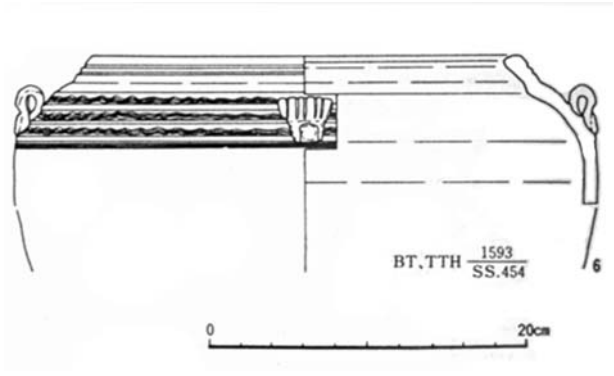


圖 24 越南窯址出土帶繫罐線繪圖



圖 26a 越南硬陶罐殘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6b 同上 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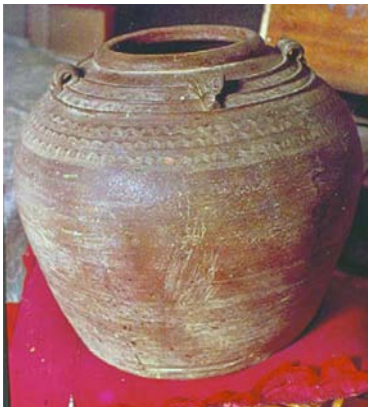


圖 25 臺灣古厝傳世的越南帶繫罐



圖 27 越南窯址出土的大口高瓶



圖 28 白釉綠彩石灰罐片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29 白釉綠彩粉石灰提梁壺
日本 福岡市美術館藏



圖 30a 陶煙斗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30b 同 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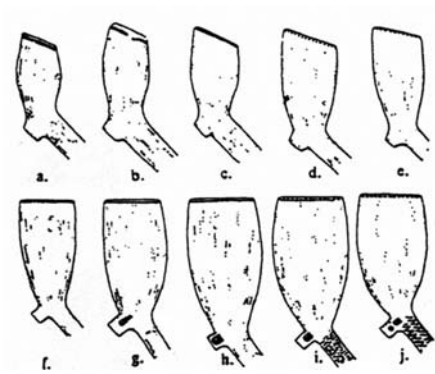


圖 31 陶煙斗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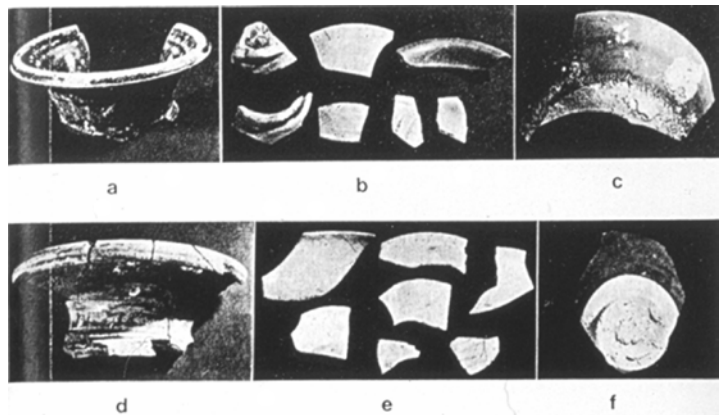


圖 32 香港九龍沈船遺跡所見泰國陶瓷標本



圖 33 印尼 Bakau 沈船發現的泰國印紋陶罐



圖 34 香港大嶼山竹篙灣遺跡出土泰國陶瓷標本



圖 35 排灣族頭目盛裝照
瀨川孝吉攝 1928-1939 年



圖 36 San Diego 沈船
打撈品 1600 年



圖 37 Cornelis Bega 1663 年
繪作所見泰國四繫罐